

学习十五大精神笔谈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

世纪之交看豫剧

孙中山公仆思想探略

论宋代法制

中原文史

第十八期

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编

卷首语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馆组织馆员和工作人员一起收看了实况转播,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本期“学习十五大精神笔谈”所发四篇文章,就是馆员们的学习体会,写得有一定深度。“精神文明建设论谈”中的《孙中山公仆思想探略》、《梁祝故里中原说》等文章,角度新颖,论据充分,颇值一读。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宋代的河南是全国的中心,为弘扬传统文化、服务当今社会,本刊从本期开设“宋史研究”专栏。本期所发三篇文章都很精彩,尤其是河大教授、宋史研究所所长王云海先生的《论宋代法制》一文,对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大有借鉴意义。另外几篇介绍、怀念文章,写得真切感人,读后令人有云树之思。

本刊编辑部

1997.11.20

目 录

学习十五大精神笔谈

-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 詹方瑶(4)
- 世纪之交看豫剧 马紫晨(7)
- 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张侠生(10)
- 用十五大精神规范思想行为 李裕兴(12)

精神文明建设论谈

- 孙中山公仆思想探略 季荣臣(14)
- 书法与京剧 周济人(18)
- 梁祝故里中原说 马紫晨(19)

目 录

宋 史 研 究

- 论宋代法制 王云海(28)
- 宋代建筑学家李诫及其《营造法式》 杨宝顺(36)
- 宋代国宝“针灸铜人”的铸造与影响 毛光骅(40)
- 北宋时中原三大理学家 刘梦成(42)

怀 念 篇

- 难忘苏先生 李冷文(43)
- 彭延泰与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 崔公让(45)

馆 员 介 绍

- 滕派螺画及其传人 申 畅(46)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

詹方瑶

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之后,省文史馆多次组织全体馆员学习江总书记在十五大会议上的报告,座谈学习十五大的心得体会,并传达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十五大会议精神的文件,特别是省政府秘书长、十五大代表鲁茂生同志向省文史馆馆员传达了十五大的盛况及主要精神,通过学习和座谈,加深了对党的十五大会议的精神和重要意义的认识,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党的十五大的胜利召开,在党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是党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党的十五大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最重要、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就是鲜明地提出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在新时期的伟大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决策就是全党表明,党决心继承邓小平遗志,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进到下一个世纪。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以什么理论为指导,举什么旗帜,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当孙中山领导了民主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但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是照搬俄国的

经验?还是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遇到了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中国革命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新结论,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方针、政策,率领全党夺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伟大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唯一正确的理论。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同样存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个结合中出现了失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没有认识得很清楚,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的条件下,没有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在阶级斗争已趋于缓和时,仍然大搞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大灾难。毛泽东同志忽视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通过生产关系中公有制程度的提高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不切实际地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结果事与愿违,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 1957 年后的实践的基础上,响亮地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针对过去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够清醒的认识,提出重新认识马列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入手,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一个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完整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党经过近 20 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功实践,在世纪之交作出的历史性决定。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诸如“拨乱反正”、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改革开放和确立以市场经济为走向的改革模式等,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之,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路线、方针、政策。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能不能发展,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大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把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整个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

大成就,但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数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在两万美元上下,全世界人均 4,400 美元,发展中国家人均 1,700 美元,而我国人均只有 700 美元,处于落后的行列。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三大报告已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论述,十五大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提醒全党一定要牢记把握我国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出主意,找办法、定政策都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国情。

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也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客观根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了许多弯路,就是没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基本的原理,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是搞一大二公,大大超出了我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违反客观的经济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脚踏实地,开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则是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是中国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遵循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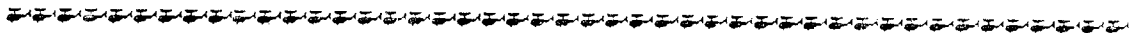
平。只要符合这三条原则,便应当放手进行改革。正如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当属国企体制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从上到下,无论巨细,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企业,在计划经济的支配下,所有的国企都背靠国家吃大锅饭,生产靠计划,销售靠调拨,亏损靠补贴,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加上管理不善,制度不严,效益不高,重复建设,不少企业出现亏损状态,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些企业缺乏监督机制,成了某些当权者贪污、浪费的温床。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是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而这些不良后果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还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企的改革是一项十

分艰巨而复杂的攻坚工程,但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充分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努力培植市场,大胆发展股份制经济,切实“抓大放小”,一手抓好大型国有骨干企业的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大力提高国有大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一手放活一大批中小企业,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锻炼成长,充分发挥其灵活机动的优势。相信在生产关系进行适当的调整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解放,新的经济体制一定会更快地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我国的综合国力一定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人民充满着信心,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十五大精神的鼓舞下,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紧紧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我们坚信,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 五 大 颂

枫叶流丹日,京华瑞气催,
运筹期大略,开济仗英才。
天阔凭龙舞,梧高引凤来,
远瞻新世纪,人在九重台。

林从龙 1997年国庆前夕

世纪之交看豫剧

马紫晨

十五大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再加一句主题词,就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我学的还不深、不透,但其中有几点却感到非常有启示,即对我们的戏曲事业,具体说,即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豫剧,并回顾100年、50年、20年戏曲所走过的道路,进而展望——也即把一个什么样的豫剧带到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也许是需要我们共同、认真思考的。

(一)

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的“戏曲改良”,中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此半个世纪中我们主要是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方向问题。建国以后提出了“改人、改戏、改制”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通过挖掘遗产抢救了一大批优秀传统剧目;经过学习整顿,艺人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戏剧改革”的结果使戏曲艺术日趋繁荣,豫剧也从一个仅流行于河南几十个县及关中、皖北、鲁西南一隅的地方戏迅速推进、拓展到21个省区,并从1983年起,在剧团数量、从业人员、演出场次、观众人数和经济效益等五个方面跃居全国三百多个剧种之首,成为众所公认的“叫座剧种”和专家学者关注的“准国家级”剧种。其根植中原、昂扬勃发的恢宏气势,不洋不土、雅俗共赏的审美效应,高亢激越、简洁明快的唱腔曲调,古今兼具,大小咸宜的表演风格,幽默狡黠、乐观向上的话

言情趣,不艰不涩、易懂易传的中州韵音,质朴无华、豁达宽厚的文化风貌,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大众格局,铸成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我国民族艺术的瑰宝,并具有典型的黄河文化的特色。近期,省委领导提出要我们“象中央抓京剧那样抓豫剧”是十分正确的指示和决策。

(二)

当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刻,审视过去几十年走过道路,又使我们感慨良多。首先,就是我们在政治上连“最大的实际”即“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国情都没有搞清楚;在艺术上,对戏曲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又给予了偏狭的理解,并用一种浮躁的心态从事剧目创作,这就使我们不能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全省创作、编演了三千部左右的剧本,而保留下来能继续上演的却寥寥无几!情况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个人认为,我们文艺界的体制改革,之所以“滞后”,原因固然很多,但对“国情”、“政情”(什么是社会主义)学习不够,等而下之,兼及对“民情”、“地情”、“商情”(市场)、“戏情”(产品)的调查了解也不够,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此,我们河南在1956和1972年曾两次把二百多个剧团全部公有化,包起来;为此,我们曾在舞台上树立了一大批“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作所为、所念所唱无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字号英雄人物典型形象;为此,就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戏曲的生存处境仍不得不面对诸多尴尬,单是在剧团“承包”的方式、方法上就经历了不少痛苦和失败的教训,有些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仍处于困惑或彷徨之中。

(三)

如何排除“左”的干扰,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一个判断体制改革成败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由是也使我联想到剧团的体制改革。就我对全省情况的了解来看,目前依然比较普遍的存在着一个“畏难”、“缩步”和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怕这怕那,许多条条框框就是打不开。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和工业、农业一样,我觉得剧团的体制改革,同样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艺术生产力),这个目的清楚了,就有了主心骨。个人认为:是否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保护、振兴民族戏曲艺术;是否有利于出人、出戏,并不断提高表演艺术水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效益、经济效益,并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这样三个“有利于”,似应成为判断剧团体制改革成败的标准。当然,这纯属个人看法,对与不对可以讨论,但总还是要有一个统一认识,有一个尺度,以便准确把握。因为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干过的新问题。建国后那种把剧团全部包起来的简单做法,并不能称之为“体制改革”。

(四)

十五大报告又指出:要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剧团、戏曲艺术——这个精神产品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这是又一个新课题。戏曲生存除了政治、

经济、社会、人民性等因素以外,还有个重要的“载体”,乃:一曰观而化之的“风”,二曰沿而久之的“俗”。“风”和“俗”又全都离不开商情贸易。所谓“庆典庆典,戏子饭碗”,“有庙必有会,有会必有戏”和“商路即戏路”等谚语,反映的就正是此类的典型事象之一。而建国后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官办、官养、官用的模式恰恰是掐断了上述这一沿袭近两千年的优伶生存之道。因此,一旦财政投入不足、“输血”不够而实施“转轨”,便势将出现戏曲滑坡、剧团不景气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正当河南(全国也一样)国营剧团举步维艰甚至难以为继,数量由277个下降到217个的时候,全省在十多年中却象雨后春笋般地又一下冒出了1206个民间(或称“社办”)剧团。这个数字是国营剧团的六倍,而这还不包括那类数量更大的、纯属自娱性质的业余剧团。这1206个剧团当中,豫剧团大约占了五分之一。其中,属“共和班”合办性质的,和“挑班”(包括“家庭班”)个人办性质的又各占了一半。虽然都是“民营”,但从经营和管理方式上看,则应视前者为“集体”,后者属“个体”。既然戏曲的生存尚岌岌可危,那么却又新增加了这批(比国营剧团还多得多的)剧团又是怎样存活的呢?一言以蔽之曰,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又重新回到了传统的生存环境和服务方式上去。下农村虽然苦了一点,但春祈秋报、节日喜庆、丰收乐、太平景、欢悦的农民总不会让戏班饿肚子。有些实力强、戏码多的剧团,演员拿的工资甚至还大大高于国营剧团。于是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城里的大剧团也不得不“亦步亦趋”地去追“风”赶“俗”了。应当承认,农民对那些从城里下来的大剧团,是异常欢迎的,车接车送,给他们的戏价也很高。不过有些不太满足的地方,就是“剧团愈大,剧目愈少”。(卖方)“我就是这几个戏,爱看不看”——往往使他们(买方)没有挑捡的余地。因此,如果你的演员还不具备马金凤(一出《挂帅》已演了五千场)、申凤梅(一出《收姜维》生前已演出了三千多场)那样的声望,那么就必须尽快多排戏,排好戏,让观众选让观众“点”,以便象当今的商品市场上一样,在艺术产品市场上

也能尽快适应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

(五)

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当今的演出市场上既然出现了前述国营、集体、个体这样一种“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局面,那么就不能只把“国营”剧团视为“公有”性质,而应把那种民间自发组织起来、属集体性质的剧团,同样也看作是“公有”,并把它列入文化主管部门的统计中去。多种经济成分既然是“综合国力”的显示,依此类推,当我们计算戏曲艺术实力和繁荣、发展的程度、水平时,是否也不应该只讲官办剧团有若干?比如豫剧,理应认为是六百多个,而不应认为是二百多个,否则就不能准确的说明问题,也不能正确地评价戏曲现状。只看二百多(官办豫剧团),不看四百多(民办豫剧团),是否仍是一种“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我拿不准,提出来讨论。

由此,我还想到了大体制中的小体制。比如:既然在一个国家里尚且可以搞“一国两制”?那么在一个大剧团里难道不可以搞“一团两制”?试以省级剧团为例,哪个团都有一百多人,许多演员派不上用场,精简中又难以安排,他们只会唱戏,职业习惯多数人也喜欢唱戏及其生活方式,但却常常在她(他)们四、五十岁正唱好

戏的时候,给以“退休”闲置,结果,本单位工资基本照发,实际她(他)们一个个却分别去“搭班”挣第二份钱去了。又何如把这些人建个松散、共和式、自选领导人的分团呢?说到此,我甚至有个预感,真有哪个团敢这么干的话,此实施新体制的“分团”,其效益、收入、影响还很可能超过“主团”哩!人才、演出、经费都合算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此外,还有“股份制”的问题。既然“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见十五大报告第五节),剧团经营是否也可以试行?听说上海有的剧团已经搞了“剧目股份制”。个人认为,一些热心戏剧事业的企业家(本省此类企业家相当不少),未尝不可以通过谈判协商,吸引他们向其所喜欢的剧团投资(也可以由一些演员集资)搞股份合作式的“分红”、“联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戏曲艺术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坚持“两向”、贯彻“双百”方针,一定不能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准确、完整地执行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并举”的政策,准确、完整地理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含义,在剧团体制改革问题上,继续解放思想;在戏曲生存和服务方式上拓宽思路,认真研究并采取措施充分开掘、发扬豫剧艺术的八大优势,相信,一个艺术上更加璀璨夺目,多种风格、多种所有制和剧团管理模式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新豫剧,必将会出现在新的世纪。



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张侠生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次大会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作为我们整个事业的指导方针。“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某些地方受到挫折，但在中国却是“风景这边独好”。这多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成就和辉煌的胜利。十五大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时空形式，更在于它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理论内涵，在于它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写进党章。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既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心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是我国新时期的伟大旗帜。只要我们能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一定能实现本世纪的宏伟目标，并能开创下世纪更加辉煌壮丽的前程。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方针和政策，并将此列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

报告系统地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三位一体地提出来，把三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具体体现。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5年，他针对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又明确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他还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深刻而透辟地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殊功能，确立了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繁荣、全面振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报告反复阐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高度认识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文化”一词,原指文治和教化。《文选》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后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具体包括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报告提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报告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而深刻。当今,我们在全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就必须按照十五大报告的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大抓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大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

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思想和精神支柱;要狠抓教育和科学的发展,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反映社会、激励人民,同时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倡导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从繁荣和管理二者入手,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群众精神文明生活的质量,此外,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吸收国外文化中先进有益的东西,以丰富我们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总之,我们贯彻十五大精神,就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仅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的大事。

我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业余文艺工作者,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肩负着文化建设的使命。我一定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殚思竭虑,竭尽绵薄,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祝愿精神文明之花在祖国遍地开放。

用十五大精神规范思想行为

李裕兴

在现代社会的变革进程中,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不断地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虽步入古稀之年,但只要一息尚存,为了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就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努力做到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这是摆在我们馆员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课题。

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地更新观念。邓小平理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他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社会上也必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地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步伐。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改造自己的主观意识,不断地更新观念,决不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用老眼光看新问题,用老办法解决新矛盾,或以超前的意识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更新观念,才能澄清疑虑,克服主观臆断,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右的和“左”的干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

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搞四化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办事情、想问题,切不可脱离实际地苦思冥想,更不能安于现状,不去探求新事物。一

句话,就是我们的思想不能僵化。否则,一旦思想僵化,就会在新的形势下对待新事物,看这不顺眼,瞧那不如意,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的条条框框、本本主义,甚至把芝麻当西瓜,把非本质的问题,看成本质问题,缺乏独立思想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只有不断增强自我教育的能力,学习新思想、新事物,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思想,理论结合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兴旺发达。

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建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的核心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基础和标准。私欲与公心是对立的一个矛盾,私欲多了,就会邪气上升产生腐败现象,公心多了,就会正气上扬出现高尚情操。林则徐有句名言“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就是私欲膨胀的根源,所以,在某些领导干部中和某些人中,滋长了吃喝高水平,住房超标准,享受高标准。有的人不分什么问题都讲经济效益,人家求你写一个字,也要讲经济效益,说什么“一字值千金”,不给钱,不提笔。多劳多得是合理合法,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得是不可取的。生财有道是提倡的,生财无道,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一本万利,无本万利,认钱不认爹,认财不认娘,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没有了。虽然这是少数人,但他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人们对事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强求他们的看法一致,也是不现实的,只要在大方向上前进,就可以了。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善于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切不可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问题,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和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我们只有在精神文明、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分辨出真、善、美、假、恶、丑,严格管住自己,在社会的变革

中不断地消除愚昧,破除迷信,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树立社会主义的高尚情操,爱祖国、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接 42 页)洞号长生宜有主,寓名安乐岂无权?他还吟道:“夏居长生洞,冬居安乐窝,莺花供放适,风月助吟哦。窃料人间乐,无如我最多”。这时,他已过着士大夫的舒适生活。今日洛南之安乐窝村即由此而得名。

邵雍在洛居住近四十年间,潜心治学,著述甚丰。其著作主要有《皇极经世》、《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等数十万言。成为北宋时期主观唯心学的奠基人之一。程颐、程颢等人把他的理学奉之为“内圣外王”之学。因此,他虽官不高,位不显却名扬四海。全国不少权贵、文人都乐意来洛拜访。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 1055 年—1063 年)诏求遗逸,洛阳留守王拱辰请他应诏,授他将作监主簿,并推为逸士,任他为颍州团练,均推故不去。从此,他的名望更高。同时也表现出他高雅不染一尘的思想。

邵雍在神宗熙宁十年间(公元 1077 年)病重。其知友司马光、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纷纷赶来,晨夕不离身边并与其子共议后事。不久邵即逝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谥“康节”。后历代皇帝敕封为“圣人”、“夫子”并送进文庙供奉。

邵雍住宅在北宋末年遗弃民间,金代,改为“九真观”。明景泰年间(公元 1450—1456),河南知府虞迁玺访得其故址,始“绕以垣墙,植以树木,构堂三间,塑康节之像于其中”。清代又屡经扩建修复,保存至今。今日之祠堂,在安乐窝村座北向南,原建筑仅存有清代硬山式“皇极书阁”三间,及殿堂等数间,并有明、清碑石多方。在《邵氏家谱》中,保存有历代重修邵夫子祠堂碑文。

十年浩劫时,祠堂又遭破坏。邵之后裔邵长春以修《邵氏家谱》罪名,划为反革命,并将邵长春之父保存历代皇帝敕封之文物及邵之著作文本洗劫一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村村民及邵氏家族纷纷捐资并得到各方支持维修,邵雍祠堂面貌一新,殿堂内又重塑了邵雍坐像。邵之后裔邵永昌老人搬进祠堂主持一切事务,并积极捐款修家谱。现祠堂已定为洛阳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不断有人拜访和资助。

(二) 程颐、程颢

程颐、程颢兄弟二人是北宋时期的大理学家、教育家。祖居洛阳市嵩县田湖镇耙楼山下程村。兄弟二人潜心修学,他二人学说,后来为朱熹继承和发展,成为更加完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宋、元、明、清四代 700 年间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世人称为“程朱学派”。二程与邵雍不同之处是在理学基础上,追随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成立学会,参与北宋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同时,也尖锐的批评北宋时的经济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著有《定性论》、《识佬篇》、《颜子所好所论》等。还有二程的追随者所编《遗书》、《文集》、《经说》等,全部收入《二程全书》中。

二程故居初建于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 1103 年),大观元年(1107 年)程颐逝世,后人即于其地修建祠堂,因程颐生前其学说影响较大,统治阶级比较重视。明景泰六年(公元 1455 年),皇帝下诏名其故居程村为“二程故里”。并在程村东敕建石牌坊一座,上书“圣旨”,下书“二程故里”,当路矗立,蔚为壮观。并诏以颜、孟之例,修建祠宇,扩建房舍 60 余间。明成化、弘治、万历、天启年间皆予重修。明末该祠宇毁于兵灾。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相继重修,祠庙又为之一新。全祠总面积 4792 平方米,布局为五进大院。内有“棖景门”、“东西坊门”、“学贯康溪”、“道接子舆”、“春风亭”、“道学堂”……以及朱熹书写 89 名弟子姓氏石碣、讲堂建筑宏伟壮观。现祠庙内有宋、元、明、清碑碣 25 块。以及康熙御书“学达性天”匾额悬挂在祠内“道学堂”门首。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 1901 年),德宗皇帝与慈禧太后游龙门时,派洛阳知县陆尔爽将其亲书之匾额以鼓乐伴奏敬送程祠悬挂。现祠堂建筑由于程氏后裔尽心保护,建筑还比较完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程后裔展开续修家谱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将散居全国各地之程氏后裔陆续编入。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程氏家谱》编续完成,原我省长程维高亦编入家谱中。

孙中山公仆思想探略

季荣臣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本世纪中国涌现出的三位巨人之一,这不仅表现在他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更表现在其思想的博大精深。本文拟就孙中山公仆思想略陈管见。孙中山的公仆思想集中体现在主权在民、官为公仆等方面。

一 主权在民

孙中山毕生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与封建专制制度完全不同的民国,他认为民国应是公天下、主权在民。他说:“民国和帝国是不同的,帝国是皇帝的一人专制,民国由全国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下,民国是公天下。好比做生意,帝国是东家生产,民国是公司生产;公司生产赚了钱,股东都有份,东家生产赚了钱,只有一个人享受”。在孙中山思想中,人民才是国家、社会的主人,有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他说:“民国是大家都有的份的,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便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再不和清朝一样,要做官吏的奴隶”。“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不同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很明显,孙中山奋争的民国,国家主权不为少数人所垄断,而属于人民。他说:“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主专制时代,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即今之皇帝也。”“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孙中山把民权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做到“人民管理政事”,国家重大事情要

人民决定和管理。

孙中山吸取欧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思想,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些权利是“附属于民权之上”的,“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方能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这就是说人民掌权是核心,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权利,人民才可能在政治地位上平等的,孙中山还说:“天生人类本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利,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因为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特殊阶级的人,过于暴虐无道,被压迫的人民,无地自容,所以发生革命风潮,来打不平等”。“这种三民主义可以一贯起来,一贯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的世界打成平等的”。

孙中山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因此,他晚年的民权思想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他考察了欧美资本主义的政治得失,认为欧美“还不能达到民权的充分目的”,“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导师”。1924年孙中山作三民主义演讲时,指出了欧洲代议制的弊端。他说:“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力,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把国事都托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胡作非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以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他认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私有,适成为压迫平

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孙中山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他的民权主张就是建立平民政府,这个平民不仅包括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包括了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在内,他们都是政权的主人。

二 官为公仆

孙中山认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如何发挥主权的效能,如何使用这个大权,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孙中山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权与治权相分开、权与能相区分的理论。他说:“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手里,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家。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国家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总之,“权”属于人民,“能”属于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权与能二者是主仆关系,权支配能,能从属于权。他认为,“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国家的政治,根本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力的专门家”。“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机器是工程师设计、制造和掌握的,其运转是受工程师指挥的,可见这些专门家是为人民劳作的,他的受人民之托管理众人之事,人民可以随时任用或撤换他们,他们的去留取决于其是否忠实于人民的利益。“至于政府自己的办事权,又可说是做工权,就是政府来替人民做工夫的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随人民志愿。”

按照权能分开的理论,既然人民有权,政府只有对人民的做工权,那么,各级政府官员自然就是为人民办事的公仆了。孙中山指出:“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

也”,“民国的政府官员,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当作汽车夫”,“或者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也就是说政府官员职位再高,也是受人民之托,为人民办事的雇员、仆人。1921年孙中山到广西南宁视察时,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讲:“革命就是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各界人士都过好生活……你们是主人,省长是仆人。仆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满意,才是一个好省长,一个好仆人”。孙中山认为,既然官员是公仆,因此不管官员职位有多高,在宪法面前,与百姓平等,任何人不能有超越宪法的权力,必须遵守宪法,尊重民意。

为了防止公仆权力的异化,使各级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而不致于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孙中山强调,必须肃清官僚政治的影响,清除做皇帝的污秽思想。中华民国成立八周年的纪念日,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层陈土的缘故。地层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中国的武人便是陈土的一种”,“政客也是陈土的一种”,“现在武人官僚的贪婪,较满清时代为甚”。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只把满清统治推翻了,而作为封建专制基础的官僚、武人、政客他们仍然在实行反动的专制统治,所以民国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民国,“便是上层越高,地基须越深,挖出的陈土还须远远丢开”,也就是必须彻底肃清武人,官僚政治,彻底清除专制制度的滋生土壤。

孙中山认为,要使民国立足于不拔之根基,还必须在革命队伍中清除皇帝思想、做皇帝的心理。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战的都是为皇帝一个问题”,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很长,皇帝思想的影响必然很深,而皇帝思想与民权思想、公仆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是一切祸害产生的根源。孙中山说:“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他总

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惨痛教训，“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互相残杀”。这种皇帝思想的存在，也是一些人背叛民国的原因。陈炯明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由孙中山亲手培植起来的粤军将领，但他背叛民国，甚至欲置他的领袖和导师孙中山于死地，其原因是什么呢？孙中山指出，“就是因为他想做皇帝”，想据地为王，建立家天下统治。孙中山从历史和现实说明“中国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做皇帝的思想没有完全铲除，没有一概肃清”。

除了肃清官僚政治影响外，要做到主权在民、官为公仆，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必须树立革命利益第一的思想，要一心为公，为革命利益勇于牺牲，反对自私自利，反对伸手要官做的低下、卑劣人格。他说：“盖人类牺牲的价值，有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就是真理和名誉”。他批评当时一些革命党人“自认为革命成功，我是党员，应该得官做，如果得不到官做，便心恢意懒，失却原来奋斗的精神”。他分析为什么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原因就是本党分子此刻过于复杂，党内的人格不齐，令外人看不起”。他号召革命党人“平日立志，应该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了党员的真精神”！孙中山强调，要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这种一心想升官发财的腐败堕落分子。在他看来，党员的腐败行为关系到整个革命的前途，因为革命的主义要能实行，革命的目的要能达到，革命党必须得人心，这就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孙中山解释说：“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党员都做官”，“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也就是要党员成为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他坚决反对尸位素餐，强调：“如果那个人的才能，可以做那件事，才可以使他做那个官；若是他的才能不能做那件事，他一定要去做那个官，便是不胜任，便没有好结果”。他要求革命党人，“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公仆。

三 对官监督

为了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孙中山强调必须建立一套对官员监督机制。他认为人民首先要有选举权，挑选有才有德的人“当我们的公仆”。但要保证公仆“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人民仅有选举权是不够的。“专行这一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其结果，“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针对一些官吏“始藉人民选举以获此资格，其继则悍然违反人民意思以行事”的问题，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人民不仅“对于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他说，“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往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

为了“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孙中山主张，“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他认为，仅仅实行间接民权的西方代议制政体，还不能算是真正民权，因为人民选举了总统和议员之后，就不能再过问政事。无论政府多么专横，在下一届选举之前，人民对它都无可奈何。因此，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翁”，不仅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监督罢免权；不仅要有权制定法律，而且还要有权废止那些不利于人民的法律。这样，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在这里，孙中山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人民不仅要有权选举政府官员，选举之后还要对其进行监督制约，“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

孙中山上述见解与主张，由于历史的、阶段的局限，难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他把世俗的封建政权观念和等级观念颠倒过来，大胆地提出：“民国以人民为主